

# 文化的怨怒与批判的软弱

——关于现代国家批判的一段不远的往事

周毅之

(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江苏南京 210008)

**摘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种故事总是不断重演。发生在上世纪关于现代国家的异化论批判,其叙事方式就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即困守着文化批判的立场,以冷冷的、怨怒和激愤的拒绝实现着虚幻的否定,呈现出至今已成定评的批判的软弱。不能仅是站在哲学的云端来反对现实的陆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学问家们不可不思考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现代国家;异化论批判;用词句反对词句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06)03-0001-07

关于现代国家,上世纪初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故事的中心情节,就是从各种不同角度(包括反思式批判的角度)为这种获得“总经理处”隐喻的国家作技术合理性论证<sup>[1]</sup>。这是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技术时代”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政治学、哲学叙事。但是,在这种技术合理性论证的对面,现代国家的异化论批判(关键词汇集在国家技术异化论批判)旗帜鲜明地构筑起自己的命题体系:技术理性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使人间变成天堂,而是使技术变成一种异己的、控制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横亘在人类面前,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使人类处于机械化了的、毫无希望的荒谬境况之中。技术理性引导着对自然的征服和蹂躏,从而使人类陷于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膨胀、城市化病等等“自然的报复”之中;技术理性造就生产(也包括生活)的机制化和形式化,使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其自然本性遭到了压抑;技术理性注重于效率和计划性的核算与目标追求,而使得人的需要(或价值)成为效率目标的附属物;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计算类型的理性,把一切具体物化约为抽象同一物,使质上的区别和非同一性强制性地纳入量的同一性之中,个性遭到否定,人也成为一种可计量的市场价值;技术理性崇尚技术规则的至上性,用技术过程取代一切,这导致人的物化、机械化和非人化,从而使人类丧失思想、丧失自由,陷于精神空虚和人格分裂中。所

以,当技术理性展开了自身的进程,其形式结构就按照自身的逻辑而推进,从而成为支配一切的、尤其是支配个人的自在的目的。尽管这种技术理性具有可以通过计算的精确的合理性,但是它却用自己的方式毁弃了对终极价值的依托,遗弃了对生命意义的关怀。因而,近代社会以来,人类从宗教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却又陷入了技术蒙昧主义的黑暗之中,而这种技术蒙昧主义的政治图腾就是现代国家。这就是技术异化论者的主要批判思路,同时也是他们批判现代国家的主要立论基础。其中,在20世纪中期及稍后,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称谓下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引人注目。到现在,这段关于现代国家的批判已成渐去的理论往事,但回味起来,却对如何解读现代国家,如何建立今天人们对国家的现代叙事方式,应说有颇多可供反思的启示。

## 一、来自“超越性个人”的国家异化论的批判

凡对现代国家观展开异化论批判的,除了拉普等人的技术程序分析和新托马斯主义引导下的神学基础外,绝大多数都依托于人本学的立场,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出发,以文化批判为其主要言说方式。属于这一统一立场中的批判首选当是存在主义哲学,其特殊出发点是“超越性个人”,是作为“个体自我”的人,是绝对优先的“个人主观性”。给当今时代以

“技术时代”命名的海德格尔把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人存在的思考系统化,创立了以“人的自我”存在为中心的体系,由此观察“技术时代”,人不过只是一种“技术展现”,是某种技术目的“材料”<sup>[2] 374-384</sup>。雅斯贝尔斯从个人的“生活”和“体验”出发去寻求自己“本真”的存在,结果发现技术时代人被“平均化、机械化、大众化”,“个别的人已消失在类型之中”,“个人不再成为个人”<sup>[3] 153,227</sup>。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论旨的萨特,视人的超越性存在、实为人的主观性标示着人比任何物都“具有更大的尊严”,所以他从“个人的主观性”出发观察了官僚国家的异化存在。在萨特那里,现存的个人把他人当成非人工具,当成地狱(“等公共汽车排队者”的比喻),使实行恐怖统治和秩序控制的官僚国家成为必然。现代国家参与的这种外在的理性控制使人“公式化”,使作为实践主体的个人永远处于异化之中。

阿尔伯特·卡缪把这种个人的公式化、机械化概括为“荒谬”。在存在主义者论及国家的言论中,卡缪的政治哲学被西方学术界视为“显得奇特”。托马斯·索尔森在讨论卡缪的政治哲学时,首先引用利奥·施特劳斯关于当今政治哲学所处时代性困境的描述:“我们所处的基本困境是由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所造成的。在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天赋权利问题的恰当解决办法是无法找到的。”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卡缪“象柏拉图那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可以支持恢复秩序和正义的道理”。“卡缪思想的主题开始是人同宇宙的对抗,很快就变为人和国家的对抗。”<sup>[4] 322-324</sup>他和其他存在主义理论家一样从“单个个人存在”出发,认为在亚力斯多德形式逻辑精神引导下的世界中,“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杀”。“起床、乘车、四小时在办公室或工厂,吃饭、乘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按照这种节奏周而复始——大部分光阴就这样流逝了。可是有一天提出了‘为什么如此的问题’,于是带着惊讶的神情对每件事开始感到厌烦。”<sup>[5] 328-329</sup>“你向我描述这个世界,又叫我把他加以分类,你列举出它的法则,而我由于渴求知识,于是信以为真。你把它的结构拆开,于是我的希望增长了。在最后的阶段你教给我,这个奇异多彩的世界可以分成原子,而原子本身又可以分成电子。你讲的这一切都是好的,我等你继续往下讲。但你给我讲肉眼看不到的行星体系,在那里电子吸引在原子核的周围……我认识到如果通过科学我能掌握现象并列举这些现象,但我却

不能理解这个世界。”<sup>[5] 330-331</sup>这就是“思想清楚的现代人”,清楚得“永远不会懂得”,清楚得“永远不能理解”。这就是卡缪所概括的“荒谬”,是对个人的“谋杀”,一种“公开谋杀”。这是社会反对个人的行动,是国家实行的“合理谋杀”。所以他的政治哲学最终落脚于“为保卫人类以反抗政权而大声疾呼”<sup>[4] 337</sup>,为使人类摆脱西西弗斯式的命运而苦苦求索<sup>①</sup>。

卡缪在关于当代社会的“荒谬”的描述中,已经把批判引向日常生活领域。关于日常生活的异化论批判,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海德格尔在关于人的“日常共在”的分析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国家问题,但已隐含着对“技术时代”的理性管理所造成的“常人”式的“平均状态”的否定。被称为当代日常生活批判大师的列菲伏尔正是在和海德格尔相接近的这种观点上,展开对现代国家的异化论批判的,并声称以此来重新理解和深化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列菲伏尔坚决反对阿尔都塞关于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哲学断裂”的观点,认为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的不是“哲学断裂”,而是“政治断裂”,即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关于最高理性实现于国家的政治结论的否定,而代之以对国家的异化论批判和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并认为马克思完成这一政治断裂的方法论基础——异化论即来自于黑格尔。列菲伏尔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政治断裂”,不象阿尔都塞所认为的“哲学断裂”那样发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而是发生于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的著作时期,正是这两部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作为“国家评论家”的地位,其精华即是关于国家的异化理论。列菲伏尔重新恢复起青年马克思在国家异化理论中关于人的二重化的分析,认为正是这种“公民”和“私人”的分离使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犹如天上对于人间,是唯灵论的存在。认为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国家拥有非人性的势力而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它把这种势力巩固和确定下来。政治上的异化(连同政治迷信;正是这种迷信把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一种生活归之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严重的异化。”<sup>[6] 110</sup>但是,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菲伏尔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肯定大体也就到此为止,而他所肯定

① 西西弗斯为古希腊神话中人物,因受天帝惩罚而在阴间服苦刑。其苦刑是把一块巨大的石头艰难地推到山顶,而刚一松开手,巨石又滚下山去。于是只得重新回到山下,再把巨石往山顶推,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的恰恰也正是马克思很快就放弃并超越了的国家理论。列菲伏尔进而认为:“我要根据国家的概念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思想,重新研究异化、神秘、经常性和差异这些问题。”<sup>[6]112</sup>由此开始了列菲伏尔对马克思的“补充”和“发挥”。

列菲伏尔在他的代表作《日常生活批判》中,猛烈抨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技术异化现象,这种技术异化使人们成为完全听命于技术和工具的奴隶,使生产、生活、业余活动以及家庭、婚姻、民族等日常生活一切领域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从而压抑了人的本能,使人失去了自由、个性和主动性,处于一种普遍性的压抑性体系的统治之下。这个普遍的压抑性是由国家的普遍干预而参与形成的。因为现代国家要确保一切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由国家普遍干预的介入而形成的压抑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干预和压抑带着合理性的特征、“知”的特征,以一种公允的技术形象在社会中成为弥漫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和文化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各种文化设施),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潜移默化。这使日常生活异化和国家异化相互推进,融为一体。列菲伏尔特别提到理论形态中的结构主义、控制论、技术性、科学性等各种具有现代性的形式主义,为这种由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提供了理性的外衣。据此,他在《论国家》中批判了福科在《古代的疯狂》中阐述的关于知识和国家的关联性理论。他指出:“在本书(指福科的《古代的疯狂》)的第一卷中,人们同样可以隐约看到现代国家和专门知识核心的组成之间的确定无疑地已取得的联系,也就是被强化了了的、作为经济的组织者的、利用知识的国家和知识论幻想之间的联系。”<sup>[6]108</sup>而这种“对知的量化、标准的确定,是一些体现,蕴涵着异化”<sup>[6]107</sup>。

另一个特点是这种压抑普遍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列菲伏尔认为马克思制定了如“社会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概念,但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必须加上消费、旅游、广告、城市社会以及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等领域,因而还必须制定一些新的范畴。正是这些以现代福利国家名义生成的所有的范围、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方面实行的压力与压制所形成的“日常性”,对个人实行着规定,销蚀掉人的个性,分解掉人的创造力,使人在“福利国家”的氛围中把注意力转向生活方式,转向汽车、旅游、电视,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支配着的消费和享乐。人正

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干预中“平均化”了,成为“常人”,而失去了“自己人”。

正是“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家变成了社会和‘人’的尺度。它对所有的方面进行测量。计量制度象征着并且日益完善这种控制——国家对社会的尺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了国家的卡夫丁峡谷”,人“缩小到了国家”。列菲伏尔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异化还表现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而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干预的普遍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已经模糊,已经分不清公共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异化已经“日常化”,表现为“人”和“自己人”的分离。他认为,在这种异化状态下,已不存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危机,而反倒存在着“公民的危机”,即“私人”日益把自己同国家视为一体,力图通过国家达到自己的私人利益,于是“公民正在消亡,与此同时,民主也在消亡”<sup>[6]116</sup>。

由于已臻“高度精致”,文化批判论者们看不到“技术时代”国家这个“合理性”的政治巨灵的自身危机,有如沉沉暗夜中看不到一丝缝隙,批判展示出无可名状的苦恼与怨忿,时时在极度悲观中疾呼“拒绝”。列菲伏尔算是对膏肓之疾开出了皮毛之药:微观革命——日常生活批判。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创造一种日常生活中异化形式的现象学,通过对这些异化形式作精巧的、丰富的描写来进行的问题研究,从而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至今想来,这种批判不过是暗夜中飘忽的叹息。而在萨特,有的只是愤怒的抨击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拒绝”,他在《七十岁自述》中说:“如果人们重读我的全部著作,人们将明白,我骨子里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sup>[7]796</sup>而卡缪却把自己的主题定为“自杀”,为了反抗政权,反抗国家的“合理谋杀”而“反叛”,同样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他们中有的作家试图用异化论的新发挥来补充马克思,而不愿看到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对这些方法论的超越。他们对马克思的补充之所以失败,多半是因为习惯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反对以人受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制约的观点来研究人,而只是从“孤独的个体”、“个体的主观性”、“单个人的存在”出发来观察人、观察“技术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国家。所以这种批判多半是悲观主义的诉说,他们不断地描写着人在技术国家这个现代政治巨灵面前的烦恼、恐惧、绝望和死亡,他们对现代国家的批判,常常满带悲怆,有时也颇为尖刻。这种悲怆,有如失却

凭依者在黑暗的虚空中挣扎时的一种绝望情绪的流露;而那份尖刻,象是一个冷静的自杀者在临死前向人世间抛出的冷冷的怨怒。

## 二、关于技术化国家的“合理性——异化”分析

如果说存在主义者对国家的异化论批判更象孤独个体的内心体验的表述,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则表现出对社会的正面的干预性,他们称自己的理论为“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用干预性的态度分析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一体化”、“同化”、“遏制质变”、“单面性”、“病态”、“合法性危机”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制度性概括,哈贝马斯反复表达为这样两个趋势:“自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曾经是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特征的原有布局和状况。”<sup>[8]</sup>对这种趋势的强调,使他们对技术的异化论批判和国家的异化论批判密不可分,或者说,使技术合理化和国家干预的结合点——技术合理化国家成为他们批判的重要对象。

社会批判理论的国家问题分析也有一个人学立场,但他们的人学立场是从“合理性——异化”的分析中体现出来的。这一分析,在他们这里的哲学前提是新康德主义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并由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过程作了技术合理化的说明。韦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国家的机制领域,看作是技术合理性在其中推行社会发展的目的合理行动的从属体系,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过程的合理性特征,但同时他也满怀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忧虑,预料到这种技术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机制的官僚主义化、社会关系的技术化,从而造成人的自由和人的思想的丧失,窒息合理安排生活的一种动员性的推动力。卢卡奇以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站在韦伯的对立面,用商品关系结构解释了这种“合理性”论题,并批判地将“合理化”表述为“物化”。因为这种商品关系结构要求人具有一种变为商品的职能,这种关系使“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裹一切的东西,以至人际关系——它的这

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了”<sup>[9] 393</sup>。这种“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sup>[9] 224</sup>。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总体人的范畴,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但也把“对象化”、“物化”、“合理化”、“异化”概念上的含混而引起的误导留给了社会批判理论。阿尔多诺、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就是以卢卡奇对作为物化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解释为基础,把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理解为“对物化的否定”<sup>[10] 429-491</sup>。但是,社会批判理论“对物化的否定”,比卢卡奇更多地引入了关于垄断出现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的分析,突出指明“异化”已经丧失了它经济上贫困的明显形态,而更多地扩展到社会的文化精神领域。即因为发达工业化社会扩展了对自然的支配,创造了异常繁荣和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sup>①</sup>,于是人在这种轻松自得中成为具有高度“合理性”工业文明的“奴隶”,成为屈从于社会政治需要而又麻木地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的人”在“合理性”的理智支配下,在自己并不意识到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丧失了自主性。这就是“当代人的全面异化”。这就是社会批判理论分析现代国家的逻辑基础。

由此出发,社会批判理论在国家领域中集中批判了技术极权主义,因为这既是国家技术化的结果,也是因为对全社会合理化管理的技术理性所要求的国家对社会全面干预的结果。他们认为这种国家中的技术极权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精神使人从宗教蒙昧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启蒙总是致力于把人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并且建立起他们的权威,然而经过启蒙的地球上都发散着洋洋得意的灾难。”“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凡是不符合计算和功利准则的都是可疑的”,一切都在“计算和功利准则”面前接受审判,因而“启蒙运动就是极权主义的。”<sup>[11] 344</sup>显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这里所说的理性极权主义,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极权主义。即如马尔库塞说,正因为“凭借它组织自

① 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20世纪“经济殖民主义”的关联,法兰克福学派极少给予关注,而只在论及卢森堡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补充时才被提到。他们把这种发达国家的繁荣主要归因于技术合理化进程和人的价值失落的代价,以完成他们的理论体系。如果引入“经济殖民主义”的经济学分析,那将势必严重破坏他们在发达工业文明封闭圈内对技术异化的文化心理批判的立论基点。这也是社会批判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努力中的一个困难环节。

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sup>[12]34</sup>“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复杂一体化已经产生一个技术行政制度,在这里,技术的合理性日益成为操纵的合理性。”<sup>[13]320-321</sup>

对这种在国家领域中从“技术的合理性”向“操纵的合理性”的过渡,社会批判理论作了几个方面的分析。首先,技术合理性的国家干预参与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繁荣景象(同时也由于对自然的掠夺和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也包括对人的“精神的掠夺”,因而这种繁荣可称为“掠夺性繁荣”——作者按),越来越多的消费品提供出来,社会“下层群众”就越来越牢固地被各种各样的统治官僚所束缚。于是,社会“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征。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异化概念成了可疑的。人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们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sup>[12]39</sup>。这种“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的社会控制,就是现代国家的极权主义。马尔库塞认为,在这种“合理性”的极权主义国家中,“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曾经是前两个世纪的真正业绩,而在能够使得被管理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的国家里,这两种自由的丧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sup>[12]43</sup>

接着,社会批判理论提出了“技术意识形态”范畴,用以说明正是科学技术为这种国家极权主义先定地设置了“拒绝发问”的意识形态,用至上的“合理性”论证了至上的“合法性”。“技术意识形态”范畴主要是针对本世纪上半期颇为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而提出来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是以强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流派为主张,其主要论据就是管理时代取代了政治时代、技治政体取代了法理化政体,技术目的取代了意识形态(价值)目的,也就是说,是“公正、中立”的科学、技术的无可辩驳的地位使意识形态终结。而社会批判理论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又是意识形态”,因为“在科学至上的思想支配下,科学和技术今天已经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效果”<sup>[14]</sup>。本来,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形态》中曾提出过,科学在

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全面泛化,已“转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它必定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由于自然和理性的永恒法则而预先注定永远存在的”<sup>[15]10-11</sup>。把批判重心转向文化精神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大大发挥了这一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科学技术会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受利用,而且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直接构成社会的“压制性”体系。“在一种新的意义上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sup>[12]39</sup>“社会的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可以肯定,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是荒谬不堪的和丑恶可耻的观念。”<sup>[12]7-8</sup>在此,社会批判理论对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操作主义、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展开了猛烈攻击,认为这些理论“构成了与社会要求的行为相一致的学术现象”<sup>[12]13</sup>。“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sup>[12]15</sup>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社会批判理论用技术极权主义范畴沟通了自由主义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在单一的社会结构中,对技术理性的不断强调而达到固化为一种至上力量的统治的顶点,即是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技术合理化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并在自由主义国家奉行。因为在这种自由主义国家中,“在技术的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显示出这样一种现实:全面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沦丧。而权力机关……是残忍,它把所有对真理和公正的要求都踩在脚下。”<sup>[16]90</sup>因而霍克海默曾说了一句著名的格言:不想论及资本主义的人,也应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马尔库塞补充了次级系统的所需条件说:“从自由主义向完全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的转变在单一的社会结构中才会发生。由于注意到了这个经济基础的统一,我们才能说,是自由主义从它自身中‘产生’了整体国家,产生了完全的极权国家,作为它自己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的完成。”<sup>[17]347</sup>在这里,社会批判理论在技术极权主义的意义上,把法西斯主义国家看作是自由主义国家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的完成。

在极权主义的含义上阐述了自由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应该是社会批判理论在现代国家批判中的独到之处。但是,联系以上整个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关联性的基本含义是技术合理性对人的“全面奴役”,是“人的尊严在预

先规定(技术理性的规定)的自由选择时沦丧”。因而可以说,社会批判理论关于国家的“合理化——异化”的分析,是以“技术——文化心理分析”为核心区域的。他们关于国家异化的结论,就是通过这种“技术——文化心理分析”获得的。他们认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阶级冲突已经成为传统范畴,因而应该转向技术系统、合理性、一体化、单面性、人际关系异化等等。也就是说,用关于国家的“技术——文化心理分析”代替关于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关于这一点,卢卡奇在述及自己的理论失误时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跟着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sup>[18 1253]</sup>这一失误被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于是,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中的技术系统,无条件地构成为异化的根源,并直接就是异化本身。由于对技术系统的必然存在和技术系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功能状态的合一,社会批判理论就在保守的实证主义面前丢失了决定性的地盘,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放弃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客观分析,而把自己的批判仅仅保留在文化心理分析的地盘上。所以,弗洛伊德主义方法论的引入,是社会批判理论学理传统的必然要求。

应该承认,“技术——文化心理分析”对于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特征具有重要价值,因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比,这种病态特征已经以无可比拟的程度深刻化和泛滥开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心理分析”已经可以代替“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因为这两者的分析对象不是时间上的交替式的连续,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派生的病态特征的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消费水平的量上的变化取消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冲突,这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无根据的假设。由于这个假设,就把批判转向了文化心理领域,而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领地交给了保守的实证主义势力盘踞。所以,社会批判理论在硕大无比的技术极权主义国家面前,除了文化心理批判,除了一味地高呼“心理革命”、“意识革命”、“拒绝”、“人的复归”而外,再无其他出路;除了游民、移民、流氓无产者、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之外,再无其他社会力量可以凭借。在他们关于技术文明蜕化为野蛮奴役的批判中,不乏有愤激而有震撼力的词句,但是,在野蛮的暗夜里却没有确有把握的文明亮点,因而尽管满纸忧愤,也只能是以浪漫式的批判作悲观主义的情绪宣泄。即使有哈贝马斯辈作后期“重建”,企求

在“交往合理性”中消解这种异化,但正如戴维·麦克莱伦说,在关于免受歪曲和统治的、相互理解和统一的交往形式扩大的问题上,“不管怎样,必须承认哈贝马斯远未明确这个社会的实现”<sup>[17 358]</sup>。

### 三、批判,该走出“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叙述方式

回顾上述异化论国家观批判,在抨击现代国家这个“自由的牢笼”、“无形的恐怖”时确有震撼人心的词句,对于消除异化、重建现代人文价值目标确有热切的追求。但是,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哲学云端里的故事,风吹云去,地上的山还是那座山。这种文化上的拒绝,呈现出来的是批判的底气不足;这种悲观主义的怨叹,展示出来的是批判的软弱。

历史上的故事常有大同小异的情节。马克思曾批评青年黑格尔派只是用“哲学”去反对“德国”,尽管有“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仍是“用词句反对词句”。他说,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理论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sup>[19 3459]</sup>。在这里,马克思的思路是,在使哲学变成现实中,超越出“作为哲学”的哲学,也就是从哲学的云端降落到实践的陆地,实现在陆地上的行走与开掘,而不是沉湎于云端里的怨怒。

这种哲学云端里的沉湎,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重要环扣值得关注。异化论国家批判有一个共同性的文化立场:对以科学、工业为支柱的现代化的疏远、逃避和拒绝。异化论批判家们也没超越这个巢穴。自卢卡奇而下,异化论批判家们大多把对象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因而当他们论及消除“物化意识”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用“唯灵论”式的唯心主义观点取消唯物主义;当他们谈论“扬弃异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做着把对象性的存在一并扬弃的说明。进到技术和国家的领域,则在反对“技术暴政”的同时,否定了技术系统的存在和进步;在批判技术极权主义国家的同时,宣扬一种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乌托邦。他们在批判中把技术系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把国家批判交给了技术批判,却正好把现实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批判留在了无事端的冥冥之中。

应该说,技术异化、国家异化,只能是一个可以有限接受的提法,消除异化的思路也不可能存在于异化理论家们的批判逻辑之中。所谓可以有限接受技术异化、国家异化的提法,只是说异化这一术语在人们普遍熟悉使用的含义下,能在一定程度上陈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病态特征,即物对人的反对与奴役,非人格的技术系统对主体的约束和控制,以及由此延伸的国家管理技术系统对人的操纵。这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异化论陈述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一种批判,但远远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质关系的终极分析。如果把这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一种陈述,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终极分析,并把这种批判看作为人道主义、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的实现途径,就有点近乎一种现代的唯一论。这种现代的唯一论,遵循着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辨,固守“头脑的批判”,而排斥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的客观的科学分析,从而在异化的玄机中把科学、技术扔进了黑暗的魔鬼之域。

“用词句反对词句”的故事,不敢说到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情节。在眼下企求通过各种词句式的“解构”,使现代国家“碎片化”的,依然不绝如缕。但是,这种努力常常如果不是沉浸在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便是在想象中真实地描绘着无法成为可能的幻影。这种把现实关系宣布为“圣物”(异化的果实)而后加以“葬送”的批判,只能是用一种对现存的东西的“解释”来反对原先对这种现存的东西的“解释”,而“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马克思称这里“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sup>[19]</sup><sup>[22]</sup>。但是,列菲伏尔曾经对自己的异化论批判充满信心:“是的,异化一词充当了显影剂和催化剂,它把被修辞冲淡了的和被知识枯竭了的无数事实,集中于唯一的一个词。它比剩余价值或生产力有计划增长概念的真正的——必须重复一遍,精辟的——理论更有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词,遭受的痛苦就转变为清醒的力量。凡是拥有这种清醒力量的人,就会知道为什么而斗争,应该反对什么,反对谁,依靠什么,依靠谁。提出有关异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的黑格尔……将政治异化弃之不顾。谁提到政治异化的?是马克思。只要参考一下政治异化,就能避免国家拜物教,也就是说,可以避免在力量的‘神赐的能力’面前吓得发抖,也用不着接受国家借以合法化的政治体现。”<sup>[6]</sup><sup>[67]</sup>这里且不说对马克思关于国家异化问题全部理论线索的误读<sup>[20]</sup>,仅就当下世界并为因为这个

宣称“痛苦就转变为清醒的力量”的批判,就再也“用不着接受国家借以合法化的政治体现”,这一事实表明,没有“改造世界”这一底气的批判显得何等脆弱。这段往事渐去了,但反思的成果是值得记取的,尤其是在我们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今天。

### 参考文献:

- [1] 周毅之.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 江海学刊, 2004(3): 76.
- [2] 海德格尔. 林中路//洪谦.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374-383.
- [3] 雅斯贝尔斯. 存在主义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4] 托马斯·索尔森. 卡缪的政治哲学//詹姆斯·古尔德. 现代政治思想.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322-324.
- [5] 卡缪. 西西弗斯神话//詹姆斯·古尔德. 现代政治思想.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328-329, 330-331.
- [6] 亨利·列菲伏尔. 论国家.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7] 萨特. 七十岁自述//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 下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796.
- [8]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哲学译丛, 1978(6): 26.
- [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10] 哈贝马斯. 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 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交往行动理论: 第1卷(四).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11] 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 启蒙的辩证法//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44.
- [1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13] 施罗尔. 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 纽约: [出版者不详], 1971: 320-321.
- [14] 哈贝马斯. 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 哲学译丛, 1979(5): 32.
- [1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16] 马尔库塞. 反革命与造反//工业社会与新左派.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0.
- [17]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18] 卢卡奇. 卢卡奇自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20] 周毅之. 应当重申马克思已经实现的方法论超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6): 70.



作者简介: 周毅之(1949-), 男, 江苏南通人。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总编, 哲学博士, 政治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